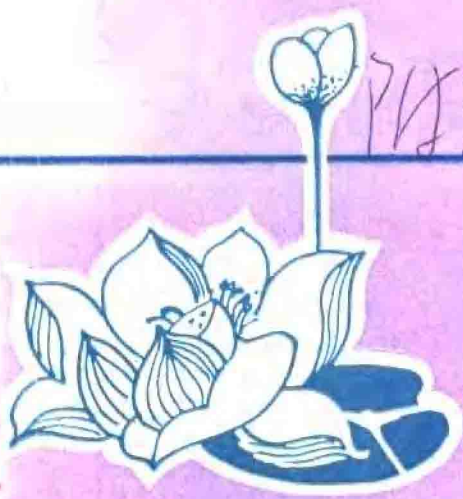


13208

WENSHIZILIAO



附第1、2、3册
目录

一九八五

4

四
85 4

永定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永定文史资料》第四辑

内部
注意
保存
资料

目 录

回 忆 录

在星系报十二年.....罗铁贤（1）

太平天国资料

天京失陷前后太平军在永定的活动.....胡江平（15）

日寇侵华暴行录

日机扫射永定城记实.....廖德润（25）

抗日后期盟军飞机在县坠毁经过.....开 新（26）

文化教育史料

永定一中发展经过漫记.....王树滋（28）

附录4（扞图）永定一中平面图.....（42）

金丰中学创办经过.....江克刚（43）

集美学校历届永定籍毕业生题名.....黄金隆·江培坤（46）

乡 土 人 物

喋血染花红——怀念胡甫开同志.....胡以按（49）

小学肄业出身的大学教师

——悼陈少珍委员.....陈炎荣（61）

江董琴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江文新（65）

传奇式人物陈逊斋.....陈炎荣（96）

记历任潮州八县卅九年知县的温月楼…………… 涂祥生 (104)

华 侨 史 料

永定华侨旅居枋城简史…………… 罗 懿 (111)

万隆会议前夕吧城华侨欢迎周总理

盛况片断…………… 谢习萍 江 萍 (125)

古 建 筑 史 料

万寿寺的史略及其传说…………… 涯 (129)

高陂桥兴废记略…………… 禹 贤 (132)

乡 土 风 情

洪坑的虾公卵粿——新丁粿…………… 林汉华 (135)

光 荣 记 录

中共永定党史资料中的若干“最早”与“第一”…… 胡大新 (137)

诗 坛 拾 锦

✓ 海外著名诗人胡浪曼诗联选…………… (139)

江德升遗诗…………… 江 城辑注 (144)



告读者…………… (103)

文史组成员照片扞页…………… (110)



封面设计…………… 赖永生

封面题字…………… 廖景凡

封二照片…………… 赖永生摄

封三照片…………… 赖永生摄

封底、封二、木刻…………… 廖 春

在星系报十二年

罗铁贤

(一)

我在1934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那时，国民党政府对大学毕业生是不负责安排工作的，学生毕业即失业。因此我在毕业之前，就到处打听有没有工作可做，但都没有结果。一直到毕业典礼已经举行，暑假已经开始以后，听说广东大埔的邹敏初先生来上海，我想邹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在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朋友很多，找他或许会有办法，所以我就到旅社去找他。见面后，他很热情，除了详细询问我父亲的近况，和叫我代为问候外，他满口答应，可以为我介绍给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并立即拿起纸笔，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叫我赶快去广州找邹校长。我拿了信向他辞别以后，心里很高兴，我想邹敏初和邹鲁是同宗，又是同乡，又都是政界要人，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大概是不成问题了。第二天我就买船票去广州。一到广州就到中山大学找邹校长，但扑了一个空。据学校人员说，邹校长是挂名的，他经常住在南京，这里实际负责人是教务长萧冠英。我听后，心里不但不失望，反而更加高兴。因为萧冠英的夫人是我的同乡，我想找到他们就更有希望了。所以我从中大出来后，立即去找萧冠英。我把邹敏初的信交给他，他马马虎虎看了一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想想，我们中山大学这学期总共有四五百个学生毕业都没有安插，那里还能安插别校的毕业生”！我听后虽然大失所望，但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所以我没有提什么要求，坐了片刻就出

来了。其实在“背景”第一的旧社会里，萧冠英说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一种烟幕，一种托词，主要是替我写介绍信的邹敏初，在当时已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否则，无论如何，他都会好好安排的。

由萧家出来后，我就去找邓初民、祝百英两教授。他们都是我在暨大时的老师，现在都在中大任教。他们说可先搬到他们家里去住，工作慢慢来找。我看到祝教授家比较宽敞，所以就搬到祝家去住，并请两教授从中介绍工作。后来经邓初民教授介绍，说某教授拟请我做他的私人秘书，专门替他编写讲义，每月发给六十元。我想这样生活虽可维持，但给私人做秘书，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说等一下再说吧。

我在祝教授家住了一个时期，他对我很亲热，就像兄弟一样。平日我写些稿子，投给香港的报纸登载，拿些稿费，倒也不错。但我想这总不是一个正式职业，在老师家住得太久，也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汕头星华日报的社长胡资周（中学时代的同学），问他的报社还要不要人。出乎意料，过了两天，他来了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去。当然，我就去汕头，找到资周。他告诉我，《星华日报》（每天出纸三张）拟增加一个时事理论副刊，由我负责。我接受了这个工作。从此我就进入了星系报。

经过研究讨论，这个副刊定名为“现代论坛”。我为了早日出刊，除在报上公开征稿外，还写信给李石岑、李达、邓初民、祝百英、沈志远、曹聚仁、张栗原、钱亦石等名流，请他们惠稿。他们都很支持，先后寄来许多时事、政治、经济、哲学、文教等方面质量很高的文章，刊出后，在当时的华南舆论界，起着重大的影响。

《现代论坛》1935年初正式出刊，至1935年6月我调厦门星光日报社后才由别人接替。当时星华日报社编辑部有总编辑张壮飞，编辑苏修武、罗铁贤、张问强、林仙桥、江练潮、林云涛等，绝大部分都是永定人。

(二)

我1935年6月调厦门星光日报社，至1938年5月厦门沦陷才离开，总共在星光日报社工作了三年。

本来筹办星光日报的社长是胡茂经，并内定总编辑是赖文清。后来因为胡茂经病逝，胡文虎乃调胡资周为星光日报社长继续筹办；而总编辑赖文清，始终没有来厦门。当时他是香港、澳门国民党总支部的书记长兼香港东方日报社长，一般人估计他不会来，但在他没有正式表示以前，又不便调换。所以胡资周就托赖文清的好友黄绿萍去征求他的意见，结果，他表示不来。胡资周报告胡文虎后，胡文虎就改派我为总编辑。我和胡资周等积极筹备，到九月一日《星光日报》正式出版，每天出纸三大张，分社论、国内、国际、本省、本市、经济、教育、副刊等栏，编辑有胡永东（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黄绿萍、苏节、郑书祥、胡一川、张肃初，记者有赵家欣、江茂夫、王悲蝉、陈火甲等。抗战爆发后，胡一川赴延安、赵家欣也作为星光日报特派记者随新四军北上。

由于报社设备比较完善，报纸内容比较充实，所以《星光日报》一经出版，销数就比福建其他各报为多，社论常被海内外报纸转载，例如香港《工商日报》的国内外舆论摘要，就常转载《星光日报》的社论。

当时因为人手少，写社论只有我一个人。每天晚上十二点看国内外重要新闻，看完后即配合大标题写社论，常常写到凌晨四点多钟才写好，写好后，就分段交给字房检字、排版、校对，工作是很紧张的，也是很艰苦的，但是看到许多读者寄来的赞扬信（我们经常有寄表给读者，请他们对各栏提出意见），心里又觉得很兴奋和愉快。

当时厦门的日、台浪人很多，一向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们看见本报大力宣传抗日，以及不断揭发他们的阴谋诡计以后，就怕得要

死，恨得要命，经常打电话来恐吓我们，写匿名信威胁我们，甚至殴打我们的工作人员。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利用日、台浪人向我们捣乱，而且还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记得抗战前夕，上海《生活周刊》为着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厦门星光日报也因登了一篇“日舰走私”的新闻，日本领事馆就向厦门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污辱日本皇军，污辱日本天皇，要封闭星光日报社，逮捕总编辑等等，厦门市政府接到日本领事馆的通知以后，惊慌万状，立即通知我和胡资周去开会，要我们向日本使馆道歉，并要登报对我进行通缉，我们不答应，我们认为新闻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能道歉，更不能通缉和封闭报社。后来，厦门市府再三要我们顾全大局，不要使事态扩大，最后，我表示可登报声明，我向报社辞职他往（实则仍照旧在报社任职），方才了事。

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还派遣大批军舰来厦“访问”，在厦门港内麇集了八十余艘，厦门港外还停泊着主力舰和航空母舰，日舰司令还“邀请”厦门各界上舰“参观”。当然，日舰“访问”厦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其目的是要向我们示威，使我们不敢抗日，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厦门的抗日怒潮却因此而更加汹涌澎湃，《星光日报》的抗日宣传也更加如火如荼了。

星光日报一方面受日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摧残。在我任职三年期间，曾受国民党政府警告多次，勒令停刊三次。主要原因，据说是“思想左倾，反对当局”。记得有一次是因为新闻检查所检查后，要抽掉一条新闻，我们抽调了，但没有补排其他稿件，让报纸“开天窗”，（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如排好版后抽掉新闻，都要重排或补排其他稿件，不准留空白，开天窗或印上“被检”字样。）新闻检查所认为这是有意捣蛋，就勒令我们停刊。但我们不卖账，一面继续出版，一面电胡文虎转电国民党中央，结果当天国民党中央就电令取消停刊命令。《星光》经过多次停刊，结果，销数越停越多，报纸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意料不到的

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积极组织抗敌后援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星光日报也更加坚定地伸张正义，扩大宣传，不断发表文章和报道，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记得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时，我写过一篇社论，题为“第×路军的大捷”（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准我们登“八路军”，只准我们登“第×路军”，但读者一看到“第×路军”，就知道是指“八路军”）赞扬八路军的战绩，阐明我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这在当时是要担当风险的。

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厦门驻军是广东军157师，该师士气旺盛，装备也不错，沿海工事做得相当坚固。他们一谈到日本帝国主义，总是怒不可遏，大骂道：“丢那妈！日本仔，如果敢来，我们就坚决消灭他们！”可是到1938年春这师军队却被调走了，换来的是河南的杂牌军，他们背着大刀，没精打采，在站岗的地方，踱来踱去，若无其事，我们一看，就预感到国民党政府已经把厦门交给这些丘八去奉送给日本了。

果然到了1938年5月6日，日军在禾山登陆后，几个小时就进入了市区，而我因为部署撤退事项，一直到敌人进至厦禾路的时候，才由中山路口的码头，雇了一条小船去鼓浪屿。过海时，日机在天空盘旋，海上已无船只来往，风大浪高，小船又只能一桨桨地划，真是急煞人也。

我是星光日报社最后一个撤离厦门去鼓浪屿的，在我还没回到鼓浪屿以前，我的爱人一直带着孩子在天台上眺望，结果却“过尽千帆都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直至傍晚时分，才看见我一个人回来，他们高兴极了，立刻围前来问长问短，好象久别重逢。

当晚听说厦门港内还有一艘英国轮船定于次日开往香港。我听后认为机不可失，第二天一早就去购买船票上船，当我们乘的英国轮船

开出厦门港时，港外日舰，正向市区和胡里山炮台大肆轰击，在市区和郊区上空，升起了无数烟柱，船上同胞看了，个个痛心疾首，愤怒极了。

(三)

我因为平时没有什么积蓄，此次又事变仓促，所以在香港登岸后，两手空空，一筹莫展，幸而我结婚时，还有两个金戒指带在手上，我便拿到当铺去当，共当了十五元。聊充食宿费用，一面又写信给在马来亚的父亲，请他汇款接济。接着我即去虎豹别墅找胡文虎和他的儿子胡好（星岛日报社长）向他们报告星光日报情况。他们答应派我为《星岛日报》国内版主编，月薪150元。我听后，心里才安定下来。

第二天，我去找樊仲云，那时他已被内定为《星岛日报》总编辑。我过去和他有点师生关系（暨大时，曾听他讲国际政治课）见面后，他表示欢迎我来星岛报社。可是不久他却跑到南京汪精卫伪府去当“教育部长”，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星岛日报》已定于最近期内出版，现在突然没有了总编辑，群龙无首，怎么办？胡好找我商量，并要我代为物色一位总编辑。当时中山大学教授祝百英经常在香港各报发表文章，在华南舆论界素有威望，所以我向胡好提出请他为总编辑，胡好完全同意，并叫我当晚就去广州，催他立即来港。我为了促使《星岛日报》早日出版，不顾当天上午日机大肆轰炸广州的危险，即乘夜车赴广州，下车后，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在暗淡的灯光下，往祝教授家直奔。我敲门进去说明来意后，祝教授表示乐意来港，于是他立即收拾行李，和我一同乘夜车返港，就这样，一日之间便顺利地解决了《星岛日报》总编辑的问题。

祝百英进“星岛”后，首先决定如期出版；（原定八月一日，只有十多天了，）其次，编辑部人员照旧；第三，社论由总编辑祝百英

和主笔冯列山共同负责，轮流撰写；第四，报头字用林森（国民政府主席）的字，但不署名。当时可供选用的报头字有三份：林森写的、林霭民写的、和吴子安写的。我认为吴子安写的太瘦，林霭民写的不错，但没有林森写的那么稳健，所以我主张用林森写的，但不署名，因为一署名便会被人认为星岛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或者亲近国民党的报纸了。祝百英同意我的意见，就决定用林森写的“星岛日报”四字做报头。这也就是直到如今《星岛》仍在使用的报头字。

《星岛日报》出版半个多月后，我和祝百英便向胡好建议出版《星岛晚报》，不几天《星岛晚报》便出版了。但是祝百英因为日夜奋战，不久竟病倒了。医生说他不适于做夜间工作，如继续做下去，很危险。他为了不影响身体和报务，就向胡好提出辞职，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去当顾问了。

这时听说金仲华已由武汉来到香港，我和星岛日报秘书苏济时，编辑张壮飞、苏节等商量后，认为可向胡好建议请他来当总编辑，结果，胡好同意了，而且还请了邵宗汉同来担任主笔。

金仲华进星岛日报后，不久又出版了《星岛晨报》。这个报纸是早晨四点钟出版，专供上班下班的工人在茶楼饮茶时阅读的。以后又出版了《星岛周报》，这是一般的时事读物。这时星岛日报编辑部人员，主要的有金仲华、邵宗汉、冯列山、罗铁贤、戴望舒、叶灵凤、张光宇、郁风、羊枣（杨潮）、钟建鼎、贾讷夫、唐碧川、丘高山、李次民、林日贞、范长江、曹聚仁、黄薇等；《星岛晚报》主要人员有张壮飞、苏节；《星岛晨报》主要人员有叶启芳、郭步陶、陶亢德、屠仰慈等；《星岛周报》有金仲华、邵宗汉、冯列山、罗铁贤、戴望舒、叶启芳等，阵容是相当整齐的。

那时香港报纸的编辑、记者，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上班，到半夜十二点多钟就差不多可回去了。国际版晚些，国内版最晚，要到凌晨四点多钟才能截稿。总编辑因为要写社论和看大样，也要到四、五点钟才能干完。所以每天晚上下半夜，宽敞的编辑部里，往往只剩下金

仲华、我、和几个校对人员，环境是冷静的，但我们看到抗战形势不断发展，精神上又总是十分兴奋的。

《星岛日报》是在抗日的炮火声中，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香港这个特殊环境下诞生的。所以它出版后，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各种不同政见。记得皖南事变后，《星岛日报》就曾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示不满。当然，国民党是不允许的。因此他们就进行打击报复。起初叫人警告胡好，今后不准同情共产党，接着就开出名单，指名道姓要胡好开除一些人。那时《星岛日报》的发行数量，除香港外，比较多的就是广州和潮汕一带，如果国民党禁止入口，报纸就无法维持。因此胡好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只好和它谈判，委曲求全。结果，胡好答应辞去总编辑金仲华和主笔邵宗汉，改聘程沧波为顾问。程沧波当时是国民党监察院的秘书长、特任官，他为了要躲避日机的轰炸和领略香港纸醉金迷的生活，特辗转托人给胡文虎和胡好推荐，放弃特任官这顶乌纱帽，千里迢迢，由重庆来香港做星岛日报的顾问。他来港后，胡好在九龙大旅店租了一套房间给他住，还给他一部汽车坐，每天晚上都到舞厅跳舞，跳到深夜，很少来报社，偶然来报社，也官僚架子十足，不同人多谈，同事们也不太理他。从此《星岛日报》的威望，就一天一天走下坡路，大不如前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星岛日报》照常出版，直到1941年12月25日英军全部投降，香港完全失陷，才停止出版。我在香港沦陷后十余天，和同事们一起，化装离开香港，取道澳头、惠阳、老隆、梅县回福建，一路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到春节前两天，才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四)

逃难归来，我经济上非常困难，所以过了1942年春节，我就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去找工作。我首先去拜访省府秘书长张开琯，他是我们永定老乡，他看见我是从香港归来的胡文虎报社的编辑，就满口答

应会替我想办法。他先后报请伪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派我为伪福建省府专员、福建财政厅视察、永安粮食调节处主任、伪宁洋县长等职。到1947年夏福州星闽日报社社长胡梦洲，打电给我，说胡文虎已派我为星闽日报副社长，要我赶快去福州，这样我又重新回到星系报来工作了。到榕后，胡梦洲告诉我，他只负责经济方面的事，编辑部的人事，全部由我安排。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编辑部的人事安排就绪。当时编辑部的主要人员，有郑书祥、胡殷、陈维震、罗选才、邱炳藻、马云霄、赵肃芳、魏良森等。他们多数思想比较进步，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星闽》一出版，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东南报坛上，销数远远超过国民党办的《福建中央日报》和伪省府办的《福建时报》。

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内战，在战场上和在宣传战线上，都斗争得很激烈。我曾对编辑部人员说：中央社的稿件，把共产党的军队称为“匪军”，这些字样我们不可能改，但在标题上我们却不能写“匪军”，而应写“共军”。又国民党的军队那时几乎天天都在失败撤退，如果天天都用大标题标出国民党军队失败撤退，恐怕会使国民党恼羞成怒，因此在标题上我们不写“国军失败撤退”，而写“国军转移阵地”或“国军胜利转移”。这样，久而久之，读者一看到“转移阵地”或“胜利转移”，就知道国民党军又失败又撤退了。

福州机关多，社会情况也较复杂。本市新闻编辑马云霄是个老福州，但编辑经验还不多，所以我特别着重抓本市版。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本市稿，改内容，改标题，直至全部稿子发完，要到晚上十二时才能回去。

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了大量搜刮民财，所以对外汇和一切重要物资都实行严格控制，报社用的白报纸也不例外。他们组织了“外汇管制委员会”、“输出入管制委员会”。本来白报纸价格是不算太高的（解放前白报纸全靠外国进口，国内不能自制），但一经管制，便成倍或三、五倍地上涨。我们的白报纸都从黑市买来，成本大增，我

为了减轻成本，特地去鼓浪屿，向输出管制委员会，申请购买白报纸。大概他们因为黑幕重重，做贼心虚，恐怕我们批评揭露吧，申请书送去后，批准了用官价供应一百吨，使我们节约了一批钱，但我们对他们该批评揭露的还照样批评揭露，绝不为了了一点白报纸，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948年春，我去上海洽购白报纸，顺道去访问了曹聚仁（当时他是上海前线日报社长），曹请我吃饭，席间见到了金仲华，大家久别重逢，都感到非常高兴。

报纸洽购清楚后，我为了再多买些白报纸，特地去南京找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陶希圣。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是我的老师，我找到他后，请他转告福建输出管制委员会多给我们一些官价白报纸，他答应可以帮助。当时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不久，社会上传说这本书是陶希圣写的，我悄悄地问他：“陶先生，听说《中国之命运》是你写的，是不是”？他听后，不肯定，也不否定，答非所问说：

“我近来身体不好。”我看他“顾左右而言他”，也就不再追问了。

南京回来不久，我接到胡文虎的电报，调我去汕头星华日报任社长。我接电后，就带着两个孩子由福州飞汕头，我再一次来星华日报了。

（五）

我第一次来“星华”是1935年，这次来“星华”是1948年。前后距离十三年，报纸内容比以前充实多了，销数也多得多了。

记得我到汕头的第二天，《星华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是：“东北局势急转直下，沈阳国军转移阵地”。的确，当时东北的局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以至节节败退；解放军则已经由守势转为攻势，节节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这样的新闻都非常兴奋，而反动当局却一面讳莫如深，一面恼羞成怒，硬说《星华日报》危言耸听，为“匪”张目，里面一定有共产党分子，要来搜查逮

捕等等，经过多方周旋，才没有前来搜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次，我去找“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喻英奇，想请他不要再禁止香港《星岛日报》进口，但当我走进他的客厅的时候，他却当着七、八个人的面，厉声对我说：“罗社长，我早就要抓你啦”！这突如其来的粗暴语言和态度，使我十分难堪和气愤。但在这杀人魔王的淫威之下，（他曾出一布告宣布有二十六种“罪”要杀，解放后， he被捕承认曾亲自批准枪毙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千八百余人，1950年已被镇压）只好忍着气说：“我没有犯什么错误呀”！他听后更加大发雷霆说：“你没犯什么错误？！第一星华报常常同情共产党；第二，你写新闻给星岛日报攻击我，你没有错？！我早就要抓你啦”！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再提《星岛日报》的进口的问题，坐了一下，就告辞了。

在回家路上，我想在这杀人魔王统治之下，生命是毫无保障的，究竟要不要离开汕头，去香港躲避一下呢？最后考虑的结果，认为喻英奇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魔王，但俗话说：“恶犬不吠，吠犬不恶”。他如果要抓我，就不会同我讲，他同我讲了，就不一定会抓我，因此我决定不离开汕头，不久他的司令部调驻潮州，也就没有同他接触了。

我到“星华”几个月以后，胡好打电报给我，说拟调我去新嘉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待遇可比“星华”社长更高，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考虑后，认为待遇虽较好，但我对总编辑这种夜生活，过得真有点怕了，再加当时新嘉坡政府只准我一个人去，家眷不能同行，所以我复电婉辞，后来胡好请了一位上海人去，而这位总编辑和胡好，在1950年乘自己报社的飞机去泰国时都不幸触山遇难了。

关于这件事，我在东北改造时，曾经引起思想波动。我想，如果1948年我去了新嘉坡星洲日报，那么解放后，我就不至于被判劳动改造，如果今天我才回国，可能还会受到欢迎。因此很后悔当时不该不去；但我又想：“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安知非祸

如果我去了新嘉坡，恐怕也早已和那位总编辑一样，跟着胡好一道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我现在虽然还在改造，但总算还保得一条老命，只要自己能好好改造，还是有前途的。我就这样反反复复，自劝自解，聊以自慰。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更加飞快发展。这时星华日报社经常收听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收到后就改头换面作为本报专电发表。所以这时《星华日报》的消息特别多，特别灵通，深受群众欢迎。中共有关方面也认为《星华日报》是“中间偏左”，起了一定作用，这时的编辑部人员主要的有苏修武、罗选才、张天斯、刘文礼、鲁本斯、曾曼慈等。

“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华南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为了统制舆论，1949年6月强令汕头十家报纸停刊，改出联合版。星华日报除派了几个人去参加联合版工作外，其余人员一律遣散。直至1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才得以复刊。

在汕头解放前二十多天，南下大军还在江西，而汕头国民党军却已经风声鹤唳，在汕头港内停了二十余艘大轮船，准备随时逃跑。那时汕头驻军是国民党军胡璉兵团，他们平时“吃空额”（即军队虚报兵额，以多领粮饷，中饱私囊）吃得很多，现在要撤到台湾，他们恐怕到台湾时要清点兵额，所以由江西撤退以后，就一边撤退，一边大抓壮丁，总计闽粤赣边境和潮汕一带被抓去几万人，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路上也没有人敢走。我们星华日报社后面的永安堂药厂也被占去关了一千多名抓来的壮丁。在总撤退前一天，他们找到十几名剃头师傅替这些新抓来的壮丁剃头，由早到晚足足剃了一天。最后连这些剃头师傅也被命令互相剃光，一同赴台。由此也可略见国民党最后撤离大陆时的狼狈相了。

汕头解放那天，星华报社大楼上首先升起了汕头市第一面五星红旗。我和星华报职工，福建同乡，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到郊外四、五里路的地方去迎接解放大军刘永生部队。大家看到解放军威风凛凛而

又和蔼可亲，都非常高兴、激动。

刘司令员是闽西人，我当时是福建旅汕同乡会主席。为了向刘司令员表示敬意和欢迎，我和福建同乡四十余人，特在永平酒楼设宴招待。刘司令员准时来了，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我们看见有三个解放军，腰间配着横皮带，乘着一辆吉普车前来，我们以为他们是刘司令员的警卫员，所以他们上来后，我们向前招呼了一下，就继续等待，一直等了半个多钟头还不见来，我怀疑了，就向一位较年轻的解放军询问：“同志，刘司令员什么时候可以来”？他听后，把手向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同志一指，“那位就是”。我才不好意思地赶快走前去致候，并请他们入席。席间他向同乡们介绍了那两位年轻的同志：刘团长、李团长；并讲了国内外形势，讲了政府的政策，报告了家乡的近况，询问了同乡们在汕的生活。他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给同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汕头十家报纸中，只有《星华》一家获准复刊，其余都已关闭。此外，市委还办了一份《团结报》，汕头由十家报纸减为两家，本来是可以维持的，但后来因为白报纸涨价，广告费锐减，便逐渐由赚钱变成亏本。解放前不管亏本多少，都由胡文虎负责，解放后，“星华”同胡文虎的关系断绝了，亏本的钱无法补偿，到1951年春债台高筑，只好申请停刊，由市委拨给三千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今三千元）遣散职工，其余债务由我清还。我搞了几个月，才清理完毕回家。

从此，我就结束了星系报十二年的工作。

（六）

胡文虎在海内外办了十几家中英文报纸，表面上看来，好象他的报纸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报业。其实不然，他只办了许多星字报，而没有真正办成为星系报。因为：

第一，在组织上虽有一个“星系报业总管理处”，但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它对各“星”字报已不能发出指令性的东西，也没有发出指导性的东西。人事方面除社长由胡文虎直接委派外，其他人员都由各报自行决定，不容过问。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各报自订，所以“星系报业总管理处”既不“管”，也不“理”，更谈不上“系”。

第二，在经济上，也是各顾各的，没有互助合作。过去星字报大都亏本，亏了就向永安堂支款，作为广告费开支，和星系报业总管理处也无关。

第三，在言论上、立场上，也不一致，社论任由总编辑或主笔撰写。如果总编辑或主笔是进步的，写出来的东西就进步；如果总编辑或主笔不是进步的，写出来的东西就右倾或反动。而过去星字报的总编辑或主笔，有些是无党无派的，有些是接近国民党的，有些是接近共产党的，甚至有些是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

总之，我认为胡文虎先生在海内外创办了十余家中英文报纸，对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但对星系报的“系”字——系统、体系、联系、派系……却没有很好完成。这也就是后来星系报走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中国大陆解放后，“星光”、“星闽”、“星华”、先后停刊了，胡文虎逝世后，新嘉坡星洲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星岛日报、槟榔屿星报、泰国星暹日报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股份也已大部出让，星系报更加七零八落不成“系”了。现在只有香港《星岛日报》一枝独秀，由胡文虎女儿胡仙经营，不但畅销香港和东南亚各国，而且还通过卫星，在欧、美、澳开办了十余个分版，遍布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盈利，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希望星岛日报继续发展，蒸蒸日上，同时，希望该报社长胡仙小姐能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